

## 打通第二次國共合作之路

### 一、為國共談判搭橋

一九三五年，日本利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速侵華步伐，五月，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何梅協定》，攫取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然後，日本就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不戰而侵吞全華北。

與此同時，在歐洲，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的戰爭叫囂，也給世界和平造成嚴重的威脅。

在此形勢下，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號召各國人民建立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為此，共產國際還指示各國共產黨必須糾正自己隊伍中自滿自足的關門主義。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了第七次代表大會，並根據國內形勢和大會精神，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名義正式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十期上。

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向國民黨及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

黨派、團體、部隊呼籲，共同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十二月下旬，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確立了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會後，毛澤東根據中央決議，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充分說明在抗日的條件下和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指出共產黨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並指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報告還回顧並總結了「九一八」以來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愛國民主人士所進行的抗日救亡運動，批評了黨內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這實際上是充分肯定了以宋慶齡等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幾年來堅持的抗日立場和與共產黨的合作。「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受到批判，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從此，宋慶齡與共產黨的關係，開始進入了親密合作的新時期。

從「八一宣言」到瓦窯堡會議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表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向聯合國民黨政府共同抗日的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但是，由於當時蔣介石還沒有根本改變對日妥協投降的立場，而且還在繼續進攻紅軍，所以，這時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沒有包括蔣介石在內。把蔣介石逼上抗日道路，從而實現國共合作，真正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需中共及全國人民進行艱苦而激烈的鬥爭。

瓦窯堡會議後，黨面臨著必須把陝北的中共中央與上海、北平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中共地下黨和愛國民主力量緊密地聯繫起來，在全國推動並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在實現這一任務的過程中，宋慶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學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大示威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領導北平及北方地區的地下黨組織的中共北方局失去了與黨中央的聯繫。為向中央報告「一二·九」運動的情況，請示今後華北地區救亡運動開展的意見，北方局寫了一封給中央的信。北方局領導人林楓把此信交給北平學聯負責人姚依林，要他設法通過魯迅把信交給黨中央。姚依林又把這一任務交給在東北大學讀書的學生鄒魯風。<sup>310</sup>鄒魯風通過在該校任教的曹靖華教授的介紹，到上海去把北方局的信送交給魯迅。可是魯迅自從一九三三年底馮雪峰奉調赴蘇區後，已失去與黨中央的聯繫；同時，他與執行「左」傾宗派主義路線的上海地下黨的關係，也處於緊張狀態。而且，上海地下黨與中央的關係，也早已中斷。於是，魯迅就把北方局的信轉交給宋慶齡，他知道宋慶齡與中共中央是有聯繫的，而且是最可靠的。<sup>311</sup>

宋慶齡與已經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是怎樣取得聯繫的呢？

原來，宋慶齡與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著聯繫。這種聯繫有多種管道，除了未被破壞之前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之外，最牢固的管道是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和共產國際設在上海的遠東局。

310 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載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征委會編：《一二·九運動》第三百二十九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311 曹靖華：《懷念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鄒魯風：《黨最親密的戰友——回憶魯迅先生》，載《中國青年》一九五六年第二十期。

因此，不管上海地下黨遭到怎樣的破壞，宋慶齡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始終沒有中斷。這種聯繫除了與共產國際或中共代表接觸外，經常的是電臺聯絡。該電臺設在路易·艾黎的養子黎雪做物理實驗的工作間，電臺由一個名叫威特瑪的德國姑娘負責操作。一九三五年深秋的一個夜晚，當知道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消息後，宋慶齡「一反往常的文靜儀態，左手拿著一瓶香檳，右手拿著一瓶白蘭地，端莊的臉上泛著紅暈」，來到路易·艾黎的家，與艾黎、黎雪等幾個國際朋友，為紅軍長征勝利乾杯。<sup>312</sup>她比誰都清楚，這意味著中國革命已走出低谷將再次卷起狂瀾，並走向新的勝利。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日本的步步緊逼及中國人民抗日怒潮的衝擊下，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已經越來越困難，於是在開始進行抗日準備和繼續軍事「剿共」的同時，使出了新的一招：找共產黨談判，企圖用政治手段解決共產黨問題。這是蔣介石推行先安內而後攘外方針的新策略。為此，蔣介石開始尋找與共產黨接觸的線索。他派出了好幾路人馬，「打通共產黨的關係」，其中一路是宋子文。<sup>313</sup>

宋子文找到宋慶齡，請姐姐設法與中共聯繫，將國民黨願意談判的消息傳遞給中共方面。宋慶齡雖然早已宣佈斷絕與國民黨中央的關係，但是現在，她認為蔣介石走出這一步符合歷史潮流，與共產黨「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若能成功，對國家和民族是有利的，因此，她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她把這個任務交給當時以牧師身分在上海從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

312 卞毓：左夫：《宋媽媽，「大眾的兒子」在向您傾訴——訪黎雪同志》，載《羊城晚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313 謹小岑：《西安事變前一年國共兩黨關於聯合抗日問題的一段接觸》，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

牧師)去陝北傳遞消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宋慶齡通知董健吾到她家裡去晤談，說要托他送一封重要的信件，到陝北瓦窯堡面呈毛澤東和周恩來。董健吾興奮地接受了委託，並且答應馬上動身。於是宋慶齡約他

第二天來取要件和路費。第

二天，宋慶齡交給董健吾要件一包和百元路費，還有南京政府財政部委員的身分證，作為沿途的「護身符」。宋慶齡叮囑董健吾沿途要小心謹慎，對密封的一包文件要特別保藏。她強調此行關係國家的利益，並預祝他成功。

那時，因陝北冰天雪地，道路不通，所以董健吾在西安逗留了四十餘天。後來得到張學良的協助——用飛機送董健吾至延安，再由防軍派騎兵護送至瓦窯堡，這時已是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底了。但毛澤東、周恩來那時駐紮在山西石樓，就由秦邦憲（博古）、林伯渠和張雲逸等接待董健吾。他將宋慶齡委託的一包要件遞上請他們轉呈在山西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董健吾在瓦窯堡等到第十天，得到秦邦憲通知，說毛澤東、周恩來的覆信已到。接著，秦邦憲把



宋慶齡在上海住所與弟弟宋子文合影。

覆信交給他，還交給他江西蘇區政府鑄的有斧頭、鐮刀的銀幣三枚及布幣整零一套，請他轉交宋慶齡，由她做主分贈或保存起來，作為珍貴的紀念品。

董健吾隨即回到上海，向宋慶齡覆命。宋慶齡為此行成功感到非常高興，並向董健吾表示熱忱感謝。董健吾還轉達了毛澤東向宋子文的致意，說明「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於聯合戰線」，望其促南京當局改變對內對外方針。<sup>314</sup>

就這樣，國共分裂後，在民族存亡關頭，宋慶齡最先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從這個意義上說，宋慶齡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立了第一功。

宋慶齡雖然與中共中央有著這樣的聯繫，但出於當時複雜的鬥爭環境和地下工作的原則，她沒有權利和義務直接溝通中共中央與其各地組織的關係，只能在必要時從側面進行幫助，如保護已暴露的同志、代轉信件、提供經費，或解決一些特殊困難等。例如宋慶齡曾通過路易·艾黎的關係，替中共中央把紅軍進入山西獲得的一筆山西省發行的地方鈔票（其中有的票面上有血污、彈孔）兌換為中央幣，然後湊足一萬元，委託宋慶齡在銀行界的朋友章乃器，電匯給西安中共中央常駐東北軍的代表劉鼎作為活動經費。一萬元這個數目，在當時是很可觀的。紅軍與東北軍達成協議後，中共在西安地區地下黨的工作，打開了新局面。這一萬元，解決了西安事變前後中共在西安地區活動的緊急之需。<sup>315</sup>

314 參見《毛澤東致宋子文》，載《毛澤東書信選集》第四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315 參見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路易·艾黎為劉鼎兌換鈔票所作的說明，藏北京宋慶齡故居。

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回到上海恢復地下工作。馮雪峰回憶，臨行時，中央交代，「被破壞後的上海地下黨組織和黨員同中央失去聯繫已將近兩年」，特別囑咐他到上海後先找宋慶齡等人瞭解一些情況後，「再去找黨員」。<sup>316</sup>可見當時中共中央對宋慶齡寄予多麼大的信任。

四月二十五日，馮雪峰到上海，住在老關係魯迅家裡，接著，就與宋慶齡、沈鈞儒、史沫特萊分別見面，向他們介紹了紅軍長征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sup>317</sup>。同上。與宋慶齡會見時，雙方商定派李雲——二十一歲的小姑娘做地下黨與宋慶齡的聯絡員。開始李雲一星期去宋處兩三次；幾個月以後，幾乎每天都去，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宋慶齡離滬赴香港。<sup>318</sup>馮雪峰不僅與中共中央建立了電臺聯繫，還先後派周文和王堯山為交通傳遞文件。<sup>319</sup>從此，上海地下黨與中共中央正式接通了關係。宋慶齡通過這條途徑與中共中央的關係也隨之更加經常和密切。她能更加及時更加正確地瞭解中共中央的方針路線，更加自覺地為黨的事業而奮鬥，配合進行各種工作，發起各種運動。

316 參見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載《新文學史料》第二輯。  
馮雪峰：《關於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工作的任務以及我同文委和「臨委」的關係》，載《魯迅研究資料》第四輯。

317 同上。

318 李雲：《三十年代在宋慶齡同志身邊兩年》，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319 王堯山：《關於上海地下黨重建的經過》，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輯。

由於排除了「左」傾干擾，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進入了親密無間、友好合作的新時期。

## 二、救國會的支柱

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八一宣言」通過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傳到上海時，就在愛國民主人士和各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強烈反響。人們相互秘密傳閱，奔相走告，心情十分激動。宋慶齡和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以及于右任、孫科等率先回應，熱誠擁護。接著，在北京「一二·九」運動的推動下，上海抗日救亡運動開始由自發分散狀態，走向組織和統一，先後出現婦女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國難教育社、職業界救國會，以及電影界、學生界、工人、新聞界等各種救國會。這些救國會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都是幾年來與宋慶齡一起進行民權保障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戰友，如史良、沈鈞儒、鄒韜奮、胡愈之等等。史良後來回憶她為什麼能積極投入上海第一個救國會——上海婦女救國會的發起工作時說，當時是因為通過「受宋大姐的委託」，營救一些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以及鄧中夏的犧牲「使我明白，靠統治者的法律來爭取人民的政治權利是不可能的。我就是在這個思想背景下，參加到愛國救亡運動的行列中來的」<sup>320</sup>。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各界八百餘人，在上海市商會舉行紀念「一·二八」四周年大會，會上正式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三十人組成理事會，創辦了《救亡情報》等刊物。會後，這個組織就在上海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救亡運動。

馮雪峰來滬傳達中共中央精神後，經過兩個月籌備，全國各界救國會在五月三十一日秘密舉行成立大會，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六十多個救國團體代表五十多人出席會議。此後，以全國各界救國會為中心，配合上海地下黨掀起更加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

大會舉行了兩天，通過宣言、政治綱領、章程等一系列檔。這些檔，貫徹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為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日和各黨派合作抗日，力爭救國會合法存在，以超黨派和獨立性的組織面目出現。檔鄭重聲明：救國會「沒有任何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不過是要盡一份人民的天職」。指出救國會「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以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為宗旨」。黨策略性地批評各黨各派過去的錯誤，著重揭露國民黨政府執行的賣國和內戰政策，指出：「大會認為中央已往的錯誤，是在政治上放棄了民族革命的任務，而只在武力上企圖征服全國；中央目前的錯誤，是對外放棄了民族共同的大敵，而只對內的消滅異己上面把國防力量孤注一擲」，「在這國家存亡間不容髮的時候，任何黨派的一意孤行，不顧大局，結果都是徒然招人民的反感。」

上述提法，與歷來的救亡組織的檔，包括宋慶齡發起的民族武裝自衛會都不一樣，特別在對待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上，表示明顯的轉變。

宋慶齡因病未能參加成立大會，但她一直關心大會的籌備和召開，並被選為執行委員。大會選舉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十四人為常務委員，主持日常工作。

救國會成立後，根據上述宣言、綱領精神，對各黨各派積極進行一系列工作。發電報、寫公開信或派專人與國民黨、共產黨及張學良、楊虎城、傅作義等各地實力派進行接觸，宣傳抗日救國主張，呼籲各方團結禦侮。

十一月，救國會舉行隆重的孫中山誕辰的紀念活動。宋慶齡在十日發表了紀念詞，著重宣傳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她指出：「全國同胞紀念孫中山先生，要繼承先生的遺志，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在目前的一個階段中，我們應該認定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並提出要打倒中華民族的大敵，必須建立廣泛的國際和國內的救亡統一戰線：「我們要聯合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參加反侵略的國際陣線……我們要聯合國內各黨各派及社會各階層人物，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  
321

《救亡情報》中山先生誕辰紀念號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慶齡明確指出的目前主要

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提出的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與中共中央逼蔣抗日通知的精神完全一致。

救國會於八月日軍進攻綏東時，支援了傅作義綏東抗戰；十月，魯迅逝世時，組織了葬禮大示威；十一月，又支援了上海滬東區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等等。

國民黨政府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組織起來。救國會成立的第二天，沈鈞儒、章乃器把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等送交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希望得到認可，取得合法地位。而吳鐵城不僅拒絕承認，並誣衊救國會是「反動的東西」，聲言要逮捕救國會負責人，解散救國會。沈、章當即表示決不退縮，並明確說明要「忠於宣言的每一句話，寧可坐牢而不願賣國」。

宋慶齡得知這一情況後，六月五日致函救國會領導人，欽佩他們威武不屈的態度，她說：「簽名於這救國會的綱領和宣言之後，我充分支持這個綱領和宣言。」並提醒他們對今後鬥爭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而對最後勝利要有堅定的信念。她指出：「我們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強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擔保你們將作堅持到底的努力。我們的路是長而艱苦的，但只有偉大的鬥爭才能獲得勝利。如果我們能夠盡力幹去，這種勝利是有保證的。」<sup>322</sup>

八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上海各報刊載了以「武裝自衛會」為名義的「自首宣言」，向國

民黨當局表示「歸順」，以此醜化宋慶齡原來領導的救亡組織「武裝自衛會」，從右的方面來干擾、瓦解救國會的活動。宋慶齡和章乃器於九月三日聯名發表《為中國人民自衛委員會事告大眾》，憤怒表示：作為武裝自衛會的發起人，對所謂「自首」的「無恥宣言，不能不加以駁斥」；指出：「自首宣言」的炮製者「根本沒有資格代表該會說話，尤其可笑的，歷史上也不會看到過任何政治集團的幹部能夠率領他們的群眾投降，所以他們的行動，不單是欺罔上級，而同時是誣衊下層群眾。」宋慶齡、章乃器明確宣佈：武裝自衛會根本沒有向任何國內政權表示「歸順」的必要，「因為該會對國內任何政權都不取敵對的態度。該會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只有在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之前，才能說得到投降，或者歸順」。<sup>323</sup>

這裡實際上點出了「自首宣言」炮製者的醜惡嘴臉：他們不過是向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搖尾乞憐的走狗而已。

九月中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佈了一個通令，誣衊救國會是「借救國為名斂錢肥己」。宋慶齡立即與馬相伯、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史良聯名發表《更正侮辱救國會之通令啟事》，嚴正駁斥國民黨對救國會的誣衊，指出：救國會各領袖「或身居指導，或直接負責，曾否斂錢肥己，想為國人所共諒」。然後反戈一擊：「十年來斂錢肥己者究為何種人，亦難逃國人之耳目。市黨部果見有斂錢肥己之事實，盡可按法懲治，何能以一紙文書，

妄加誣衊救國陣線下之全國界救國聯合會。」《啟事》諷刺國民黨當局：「黨政諸公既不能領導人民從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動組織應何欣慰之不遑，詎忍誣為反動，實所不解。」<sup>324</sup>

九月十八日，上海各團體代表二千餘人上街舉行紀念「九一八」五周年的活動。事先，在救國會的強烈要求下，國民黨當局曾默許這次活動。但是，群眾在遊行時，還是遭到了國民黨軍警的襲擊，造成血案。史良在阻止員警行兇時，亦被打傷，住進醫院。

宋慶齡、何香凝等對國民黨當局壓制群眾救亡運動的行徑非常氣憤。她倆聯名發出快郵代電，向全國民眾揭露事件真相，控訴「九一八」血案：「受傷者達百人以上，失蹤者數十人，被捕者二十餘人。受傷者多數為女子，且均傷在背後，狠毒情形，難以盡述」。「代電」責問國民黨當局：「民眾甚至不能和平紀念『九一八』，國事尚堪問乎？政府準備抗敵之諾言，尚能為人民所信任乎？政府果欲人民忘『九一八』之恥，以便於敵人之亡我滅我乎？」要求「主持公道，嚴辦負責官吏，撫慰受傷人民，釋放被捕諸人，以安人心」<sup>325</sup>。

接著，宋慶齡等又以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名義，就「九一八」血案向全國發出通電和《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民起來，共爭抗日救亡的權利。在《告全國同胞書》中悲憤地訴說道：「我們要求一個愛國的自由，我們萬想不到而且也永不會忘記在『九一八』五周年的今天，我們要在自己的刀棍之下，流我們的赤血！同胞們！中國還沒有滅亡，我們已經

324 《救亡情報》第二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325 《救亡情報》「九一八」五周年紀念血案號外，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不能紀念『九一八』，我們能忍受嗎？我們能甘心嗎？」<sup>326</sup>

十一月，反動派見救國會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勢不可擋，壓抑不住，破壞不了，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又使出新花招：他們僱傭一幫嘍囉，揀起「武裝自衛會」、「反蔣抗日」的招牌，鼓吹非法鬥爭，從「左」的方面干擾破壞救亡運動，並為鎮壓救亡運動設置陷阱。十一日，宋慶齡和章乃器再次發表聲明，戳穿騙局，要大家警惕，指出：「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分會，早已經停止活動。現聞仍有人假借該分會名義，私自進行組織。也許是少數會員的個人行動，但是也盡可能是奸細誘騙青年再加毒害的一個陷阱，希望大家不要貿然參加，免受暗算。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大眾，可以自由加入各救國團體，為民族解放努力！」<sup>327</sup>

總之，宋慶齡的確如她表示的那樣，「充分支持」救國會的鬥爭，非常關心救國會的工作，時常參加救國會的決策會議，與各救亡運動領袖共商救國大計。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有一次，她因故不能出席救國會的執委會會議，就請章乃器為她請假並申述她對開展救國會工作的意見外，還特致函執委會表示：「月來諸同志在各地努力奮鬥，至慰心懷。整個領導，亦甚正確。」又提醒說：「惟救國功業，至為艱苦，如欲獲得最後之勝利，尚須有更大之努力。尚希諸同志再接再厲，以取得民族之解放！」<sup>328</sup>

326 同上。

327 《救亡情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28 同上，第二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這封信表明，宋慶齡滿懷熱忱地支援救國會的工作，是救國會的中流砥柱。

由於健康及其他原因，宋慶齡對於「七君子」被捕前救國會的工作，主要是在指導思想和精神上及經濟上給予支援。

救國會經費沒有來源，主要靠章乃器「破家維持」：一點儲蓄用完之後，連房子也賣掉了。宋慶齡為此幾次捐助了幾千元。<sup>329</sup>

宋慶齡還對胞弟宋子文（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做工作，勸促他暗中同情和支持救國會，如募捐經費、解決糾紛等。後來宋子文給救國會的捐款，都由宋慶齡轉交。

宋慶齡雖然實際上在救國會中處於領袖地位，但她自己並不以領導者自居，救國會總幹事胡子嬰說：宋慶齡一直「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員，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我們每個人都由衷地敬愛她、尊重她，把她看作我們的帶頭人、我們的親人。提到『孫夫人』的名稱，都會情不自禁地產生一種深厚的親切感情」。<sup>330</sup>

### 三、營救「七君子」

中國共產黨高度評價、全力支持宋慶齡和救國會領導人推動全國各黨派聯合抗日的努力，並在行動上互相呼應、密切配合。

329 章乃器：《我和救國會》，載《救國會》第四百四十二、四百四十六頁。

330 胡子嬰：《光耀日月，氣貫長虹——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二頁。

工農紅軍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協定後，在一九三六年四月渡黃河東征，開赴抗日戰場。但是國民黨卻以十萬兵力阻攔。中共中央考慮到國難當頭，以保存國防力量為重，就顧全大局回師河西。五月五日，紅軍向南京政府發出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中國共產黨中央還考慮到在新的形勢下，蔣介石的態度有可能改變，於是就放棄了「反蔣」的口號，開始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致函國民黨中央，申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準備重新建立國共合作政策的決定。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正式派潘漢年為代表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潘漢年同時又是中共上海辦事處主任，辦事處的任務是在國民黨及各民主黨派、著名人士中進行統戰和情報工作，並兼負責上海地下黨組織和黨員的聯繫事宜。

為了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的破壞，談判是秘密進行的。但是共產黨相信宋慶齡，托請宋慶齡給予協助。中共中央指令潘漢年到上海後，先去拜會宋慶齡，當面申述具體組織統一戰線的意見，出示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中央的信，請求指導，共同商議他在南京公開活動的辦法。潘漢年到上海見到宋慶齡後，面呈了毛澤東九月十八日寫的一封親筆信。在信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宋慶齡表示了無限敬仰之情，信寫道：

「慶齡先生左右：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一九二七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

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接著，信中希望宋慶齡「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以「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並托清幫助潘漢年的工作，介紹她比較接近的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潘漢年進行晤談。<sup>331</sup>

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要宋慶齡以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資格，幫助共產黨實行逼蔣抗日政策。宋慶齡閱讀此信後，為獲得共產黨的高度信賴而深為感動，同時也感到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更加重大。她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委託，熱忱地幫助潘漢年開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並在領導全國救國會的工作中，積極貫徹逼蔣抗日、推動國民黨中央改變錯誤政策的方針。這種思想和策略，在營救「七君子」的過程中有著充分的體現。

宋慶齡等救國會領導人的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統治集團的恐慌，他們懼怕以救國會為中心所發動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危及自己的統治基礎，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肆無忌憚地秘密逮捕救國會常務委員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七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

沈鈞儒等被捕後，宋慶齡立即領導救國會採取一系列措施進行營救。

事件發生的當晚，負責編輯救國會機關刊物《救亡情報》的宣傳部總幹事吳大珉，就以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三位領導人的名義，起草了《全救會為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及國人書》，取得宋慶齡同意後，趕往印刷廠出版發行《救亡情報》號外。<sup>332</sup>同時，通過薩空了主編的《立報》，在二十四日將七人被捕的消息公諸於世。另外，還發表《全救會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sup>333</sup>——這些措施及時挫敗了國民黨妄想秘密處置七君子的陰謀。

宋慶齡在二十六日發表的《為沈鈞儒等人被捕聲明》中，表示：「余以全國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之一，鑒於全國救聯七領袖被捕，特提出抗議；反對此等違法逮捕，反對以毫無根據的罪名橫加諸於領袖。」

「聲明」尖銳地揭露此事是國民黨反動派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所為，但為了貫徹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日、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的方針，聲明強調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這種逮捕以及這些罪名都是由於日帝國主義者的影響所致……全國救國聯合會眾所昭知的目的，完全是促進政府與人民一致成立聯合戰線，抵抗日本侵略。恰恰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挑撥武斷的言詞相反，救國會既不袒護共產黨，也不反對政府。這些罪名完全是日帝國主義者故意製造出來，使中國政府與救國會發生惡感，由是將政府與人民分裂，以遂其陰謀的。」宋

332 吳大珉：《在宋慶齡同志領導下工作》，載《中國財貿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333 《救亡情報》第二十八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慶齡斷定：「我要指出日人方面這種策略，完全會出於他們原來的意料之外，僅能更引起中國人民反日的忿怒和愛國的熱誠……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經被捕了，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迫不了的。」

「聲明」能首先揭露逮捕七君子事件是國民黨與日本勾結所為的真相，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因為正是「七君子」被捕的當天，上海市長吳鐵城會見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對日本方面在日資紗廠罷工期間所表現的「隱忍自重的態度」表「感謝」，並向日方表明以逮捕救國會領袖來平息罷工風潮的「苦心」。對此，日方表示滿意。<sup>334</sup>但是，這種幕後的陰謀勾當是極其秘密並鮮為人知的，所以，宋慶齡的揭露，對敵人是個沉重的打擊。

為此，日本帝國主義對宋慶齡極為痛恨，必要除之而後快。他們在上海的報紙大肆造謠說，宋慶齡也為法捕房所逮捕，其「罪名是共產黨活動，與第三國際有聯繫」云云。

這種謠言，既低劣又醜陋。宋慶齡的聲明中說：「對我個人的攻擊罪名，這是不值一笑的。我也用不著來駁斥這些日本報紙的污蔑，他們的慣於毀謗造謠卑劣宣傳，早已有目共睹，有耳皆聞。」

「聲明」一改過去直接譴責國民黨法西斯暴行的做法，而取曲筆，既打擊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又譴責了國民黨反動派，一箭雙雕。這種政治鬥爭的藝術是很高明的。

334 參見若杉總領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致日本外務大臣有田的電報，載〔日〕《現代史資料》（十三），日中戰爭（五）《第四十、四十一頁》。

宋慶齡還積極動員國民黨內的正義力量參加營救「七君子」的活動。十一月二十三日，她從胡子嬰處得知章乃器等人被捕的消息後，當即爭取了孫科，托他持她的親筆信到南京找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信中駁斥了國民黨把「七君子」誣為共產黨的說法，請馮玉祥主持公道，迅速電蔣介石立即釋放章乃器等七人，並請馮玉祥同孫科共同商議進一步的營救辦法，如需她和何香凝聯名發電時，「立即把名加入可也」。<sup>335</sup>馮玉祥閱信後，即與孫科商議營救辦法，並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給正在洛陽的蔣介石發電，指出章乃器等入熱心國事，「尚非如報紙宣傳之共產黨及搗亂者，且其設立救國會宣傳救國，立論容有偏激，其存心可為一般人所諒解。今若羈押，未免引起社會之反感，而為日人挑撥離間之口實。擬請電令釋放」。<sup>336</sup>

同日，馮玉祥又覆函宋慶齡，告知他已給蔣介石去電，並與孫科設法營救「七君子」。

十二月七日，馬相伯也致函馮玉祥，要求他出面營救沈鈞儒、章乃器等人。接著，宋慶齡又安排被捕者家屬胡子嬰等人赴南京進行營救活動，並為他們寫信給馮玉祥，「請示營救辦法」。<sup>337</sup>

宋慶齡和救國會這一系列營救「七君子」的措施，立即受到上海和全國同胞的積極回應。

335 《民國檔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336 同上。

337 同上。

國民黨反動派製造「愛國有罪」冤獄，人心喪盡，震動全國，激起人民強烈的義憤，各方面人士紛紛向國民黨提出抗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馮玉祥、于右任在南京發起徵集十萬人簽名營救活動，「以表示民意所依歸，而促南京最高當局之覺悟」。<sup>338</sup>海外華僑及美國的杜威、愛因斯坦等十六名教授、學者和社會要人，都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恢復沈鈞儒等人的自由。

逮捕「七君子」，也引起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的強烈不滿。十二月初，張學良隻身前往洛陽會見正在那裡部署「剿共」內戰的蔣介石，要求他釋放「七君子」，但蔣介石拒不採納。張學良甚至質問蔣介石：「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介石頑固堅持鎮壓救國會的反動立場，成為激發西安事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七君子」被捕後，充分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的高風亮節，在獄中和法庭上堅持愛國無罪的立場，粉碎了一個又一個威脅、利誘和勸降的陰謀。

宋慶齡領導救國會，密切配合「七君子」的法庭鬥爭，堅持不懈地進行營救活動，同時又堅持救國會日常的救亡工作。

當時情況十分複雜，如果就事論事，從憤激的情緒出發，很容易把救國會和人民的仇恨引向國民黨政府方面去，從而會在國內出現更大的分裂和混亂，而讓日本侵略者坐收漁翁之

利。十二月十六日，宋慶齡與馬相伯、何香凝三人親筆簽名向全國同胞發表《為七領袖被捕事件宣言》，重申救國會不反對政府的立場，使案件的鬥爭大方向緊緊對準日本帝國主義，以駁斥國民黨反動派強加的「反對政府」的莫須有罪名和親日派的挑撥。「宣言」指出：「救國陣線唯一的目的只在促成全國人民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政治主張如何，能夠團結一致，完成抗日救國的任務。救國陣線絕不反對政府，恰恰相反，它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我們正同全國有良心的同胞一樣，要求立刻無條件恢復被捕九位先生<sup>339</sup>的自由，釋放一切因愛國行動而被捕的同胞，以鞏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作，加強全民族抗敵的力量。」鄭重申明：「救國陣線的立場始終沒有變更過，而且今後也絕不會變更。」

340

為了用實際行動表示這種立場，宋慶齡在「七君子」被捕後毅然擔負起救國會日常的領導工作。國民黨反動派原以為逮捕「七君子」後，救國會就會解體，至少可以嚇退一些人，抗日救亡運動就會消沉下去。但是，事實卻恰恰相反。

「七君子」被捕後，不少救亡團體被摧殘，救亡刊物被查封，宋慶齡為使救國會的機關刊物《救亡情報》繼續存在，就把該報的公開通訊位址改為她的寓所「上海莫里哀路（今為香山路）二十九號」。吳大琨回憶：「這樣，在『七君子』被捕後，『救國會』的工作非但沒有停頓，反而較前更加積極地開展起來。這是當時宋慶齡同志不畏強暴、挺身而出、積極領導

339 七君子被捕後幾天，南京救國會領導人孫曉村和曹孟君也被逮捕。

340 《救亡情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的結果。」<sup>341</sup>

不僅如此。「七君子」被捕後，鬥爭更加艱苦和危險，宋慶齡不僅關心救國會工作人員的生活，還十分注意他們的思想品德教育。吳大琨深情地回憶說：「有一天，宋慶齡同志通過格蘭尼奇邀請我到她家裡去喝茶。這是我第一次進入聞名的莫里哀路二十九號做客。我向宋慶齡同志彙報了一些救國會的具體工作情況。她一邊聽，一邊點頭……她因知我是留日學生，也就隨手把她剛收到的一本日文書送給了我。她著重告訴我，有人利用『救國會』的名義在各地招搖撞騙。她說：『你們思想純潔，鬥爭勇敢，但也有人經不住考驗，被人收買了，你要注意！』她那嚴肅而慈祥的教誨，是我終生不能忘懷的。」<sup>342</sup>

獄外救國會的工作和鬥爭，給了獄中「七君子」極大的鼓舞。一次，他們從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請願慰問代表團送來的慰問品中，發現一張字條，上寫：「救國會組織愈加健全，工作依然不懈。」四十多年後沙千里回憶說：「讀了這些信和字條，我們都非常感動，也感到快樂。」<sup>343</sup>

341 吳大琨：《在宋慶齡同志領導下工作》，載《中國財貿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342 吳大琨：《在宋慶齡同志領導下工作》，載《中國財貿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343 沙千里：《漫話救國會》第五十二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 四、發動「救國入獄運動」

在國內外強大的抗議聲浪衝擊面前，國民黨政府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尤其在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但他又不甘心輕易釋放他們，而想找一個體面的解決辦法。為此，國民黨幾次開庭審判，企圖以「危害民國罪」判罪後，使「七君子」具悔過書、找保釋放，但是遭到幾位被告和他們的律師的堅決駁斥。

這樣，一直拖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江蘇省高等法院再次開庭，企圖對「七君子」強行判罪。宋慶齡等感到營救「七君子」的阻力仍然很大，需採取非常措施，才能突破阻力，取得進展。這時，馮玉祥得悉此事後，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密遣女兒馮弗伐持其親筆信送往何香凝處，再轉宋慶齡，建議宋慶齡「以國母的身分，也要求與『七君子』一同坐牢」。<sup>344</sup>宋慶齡、何香凝接讀馮玉祥來信後，深表贊同，立即發起歷史上罕見的「救國入獄運動」。

經過短暫的幾天醞釀，她倆聯絡了諸青來、彭文應、張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張宗麟、潘大逵、王統照、張天翼、沈茲九、劉良模、胡子嬰、陳波兒等十六人，作為運動的發起人，起草了兩個檔：《為沈案呈蘇州高等法院文》、《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及附件《救國入獄運動規約》。六月二十五日，即第二審開庭時，宋慶齡等就把十六人簽名蓋章的呈文提給法院，及時地配合了「七君子」在法庭上的鬥爭。

呈文義正詞嚴地宣佈：「愛國無罪，不待煩言，沈鈞儒等從事救國工作，並無不法可言，羈押囹圄，已逾半載，倘竟一旦判罪，全國人民均將為之惶惑失措。具狀人等或為救國會會員，或為救國會理事，或雖未加入救國會而在過去與沈鈞儒等共同從事救國工作。愛國如竟有罪，則具狀人等皆在應與沈鈞儒等同受判裁之列。具狀人等不忍獨聽沈鈞儒等領罪，而願與沈鈞儒等同負因奔走救國而發生之責任。為特聯名具狀，束身待質，仰請鈞院將具狀人等悉予羈押審訊。」

呈文氣壯山河，大聲疾呼：「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具狀人等願以身試法律上救國之責任。」<sup>345</sup>

《救國入獄運動宣言》莊嚴地向社會聲明：「我們準備好去進監獄了！我們自願為救國而



為爭取釋放「七君子」及被捕的愛國者，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發起了「救國入獄運動」並發表宣言。圖為宋慶齡當時向上海新聞界的書面談話。

入獄，我們相信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責任！」

「沈先生等犯了什麼罪？就是犯了愛國罪。」；「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要搶救危亡的中國。我們不能因為畏罪，就不愛國，不救國。所以我們要求我們所擁護信任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鈞儒等七位先生釋放。不然，我們就應該和沈先生等同罪。」宣言闡明了救國入獄運動更廣大的意義在於：「我們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國人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宣言最後號召大家都來參加「救國入獄運動」。

在《救國入獄運動規約》中，一本救國會原來的宗旨，為表明運動合法、有理、光明正大，及推動國民黨政府抗日，強調「救國入獄運動應完全在合法範圍以內為之。對政府應熱誠擁護，對法律應嚴格遵守，且不得有任何擾亂治安，妨害秩序以及其他一切軌外行動」。<sup>346</sup>

這些檔，充滿正義和機智，是極其出色的戰鬥檄文，充分反映了宋慶齡特殊的戰鬥風格。它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和無情的揭露，又使他們無隙可乘、無可奈何。

由於國民黨封鎖這些檔，社會上有些人開始對宋慶齡等人的行動不瞭解，只覺新奇，甚至有誤解。為此，宋慶齡、何香凝等召集上海報界的記者，發表關於「救國入獄運動」的書面談話。向他們報告這個運動的動機、經過以及他們今後的態度和希望，使大家對這個運動有個正確的

瞭解，消除誤解，並望新聞界在言論及新聞報導方面，多多說明，使這個運動能夠擴大。

書面談話在批駁檢察官的指控後，指出：「總而言之，沈先生等的案子，絕對不能成立……要是這樣毫無根據的案子，法庭竟判定有罪，那就將成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冤獄了。」談話強調，「這不僅是一件冤獄而已，而且在政治上要鑄成大錯」；「如果愛國就有罪，那麼中華民國的國民，還再有人敢去愛國嗎？……這關係到絕不是沈先生等七位，而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愛國的人民，而是整個中華民國的前途。」她們莊嚴宣告：「救國有罪這一惡例是萬萬開不得的。」

這樣就闡明發起「救國入獄運動」是用的正行若反的諷刺手段，要達到的是愛國無罪、「七君子」應該釋放的目的，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政府鑄成歷史大錯。

為爭取運動的合理合法，推動國民黨政府在西安事變後邁出更大的前進步伐，書面談話用的是十分和緩的語氣和充分說理的方法。它指出：「最近半年以來，時局已大有進步，西安事變與三中全會之後，和平統一已成，抗日準備已在進行。救國會方面已屢次表示，願意完全受政府領導……在這時候當局應該仰體孫中山先生和平寬大的精神，蔣委員長團結禦侮的意志，一面把七位先生釋放，一面允許救國自由，然後上下團結一致，共謀民族復興，這樣中華民國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談話認為，「救國入獄運動」是「一種和平的合法的救國運動方式」，「是目前最適合的一種救國方式」。「假如我們採取別的方式來做救國運動，也許會引起當局的誤會。現在我們

寧願犧牲自己，來促成團結抗日與救國自由，是斷不會引起當局的誤會了」。

宋慶齡等最後堅定地表示：如果法院竟判決沈鈞儒等有罪，或即使不判罪而長期羈押，我們就準備一齊去法院，要求法官收押。「……我們講過了這些話，以人格保障，都要做到。直到七位元先生恢復自由，愛國無罪達到目的，我們的工作才完。」<sup>347</sup>

七月四日，何香凝又致函宋子文和孫科，並請他們轉達蔣介石，表示完全支持宋慶齡等發起的「救國入獄運動」，並且說她在孫中山彌留之際，曾應允保護宋慶齡，因此，「孫夫人如果入獄，香凝決偕行也」。她十分堅定地表示：「革命目的既為人民解除痛苦，今反以救國獲罪，此香凝之所以甘願入獄，冀輕全國政治犯之罪，俾其作民族生存抗敵先鋒。香凝年近六十，行將就木，何惜殘廢之軀，如能貢獻國家社會，萬死不辭。」<sup>348</sup>

何香凝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表明在國民黨中樞有著宋慶齡的強大後盾，預示了「救國入獄運動」勝利的前景。

宋慶齡和何香凝的書面談話發表後，「救國入獄運動」就在上海和全國人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愛國有理」、「救國無罪」的怒吼震撼神州，全國各界紛紛響應，踴躍參加「救國入獄運動」。上海電影界著名導演和演員應雲衛、袁牧之、趙丹、鄭君裡、白楊等二十多人，於

347 《與宋慶齡等關於救國入獄運動對上海新聞界發表的書面談話》，載《雙清文集》下卷，第一百八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348 原件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七月三日，也具狀江蘇高等法院，請求收押，願與「七君子」同享自由或受處罰。作家何家槐等十三人，於七月二日，具狀投案，願為救國而與「七君子」負「連帶責任」。許多大學教授、大學生、職員、工商業人士甚至年老的家庭婦女，都簽名要求「愛國入獄」。救國會在上海還發起一個聲勢浩大的簽名運動，準備簽滿萬人書。宋慶齡所期望的「救國入獄運動」果真轟轟烈烈、浩浩蕩蕩、洶湧澎湃地出現了。由於這是宋慶齡領導的，就使運動本身具有無可非議的和平合法性，國民黨反動派對之無可奈何，不敢公開干涉和鎮壓。

七月五日，因國民黨仍遲遲不釋放「七君子」，宋慶齡等十二人<sup>349</sup>。就遵照諾言決定赴蘇州自請入獄。

為避免國民黨警憲的干擾和破壞，他們約定時間、車次，各自分別前往車站候車。宋慶齡因工作繁重，十分辛勞而胃病復發，已有好幾天沒能好好吃飯，但她毅然忍受著胃痛，堅定不移地與大家一同前往。她對規勸者說：「不要緊！精神還是很好的，別人因救國而受罪，我這小小胃病，算得了什麼！為了爭取民族解放，救國自由，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我！」<sup>350</sup>當她由胡子嬰攙扶著快步走入車站時，大家即以目示意，跟隨著匆匆上車。

到達蘇州後，每人提著一個裝有換洗衣服、洗滌用具等的提箱下車。宋慶齡也是自己提著箱子，撐著把紙傘走出車站。她帶領著大家，正義凜然地直奔江蘇省高等法院。該院院長

349 另外四人因病或未在滬沒有同往。

350 《婦女生活》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

和首席檢察長得悉消息後，慌了手腳，不敢出來接待，派出兩個助理人員敷衍。宋慶齡說：「我見蔣委員長，他都親自出來。」堅持非同院長、首席檢察長直接談判不可。院長要求他們推派代表會見。宋慶齡、胡愈之、諸青來被推為代表。

宋慶齡責問院長：「救國有罪無罪？如果無罪，應把七位救國會領袖立即釋放；如果有罪，則把我們一起關押起來。」院長理屈詞窮，只是支支吾吾，答非所問，說什麼：「蘇州天氣太熱，還是請你們早點回上海去休息吧！」宋慶齡又嚴肅地說：「我們不是來蘇州乘涼的，而是來自求入獄的。」首席檢察官竟中途離席，欲以不理了之。院長無可奈何，只好說：「救國會本身是無罪的……」；對自己投案的人，說要補足證據法院才能受理。雙方相持很久。宋慶齡等明知這是一場製造輿論的政治鬥爭，於是趁機提出要入監探視「七君子」。法院被迫答應。<sup>351</sup>史良回憶：「我永遠不會忘記，宋大姐到牢房裡來看望我們的情景。當我同大姐緊緊擁抱時，不禁熱淚盈眶。大姐給我們帶來了水果和食品，再三安慰和鼓勵我們，她說：『民族危亡，愛國無罪，全中國人民都在支持你們，你們是一定能夠獲得自由的。』」<sup>352</sup>

宋慶齡等人的行動，當時就在蘇州傳開，人們盛傳「國母」孫夫人來蘇州營救「七君子」

351 《宋慶齡等赴蘇請求羈押經過》，載《救國無罪》第一百三十六頁，時代文獻社一九三七年版。胡子嬰：《光耀日月，氣貫長虹——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潘大遠：《我參加救國會活動的回憶》，載《救國會》第四百八十三頁。

352 史良：《深切懷念宋大姐》。

了。大家交口稱讚宋慶齡的鬥爭精神，當日就有姜源等三、四十人也到法院遞呈狀要求入獄同服「愛國罪」。<sup>353</sup>

宋慶齡等當晚返回上海。「以便補辦證據」再請入獄。第二天，十六位發起人致電林森（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長）、汪精衛（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馮玉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及孫科（立法院長）、戴傳賢（考試院長）、居正（司法院長）、于右任（監察院長）、王用賓（司法行政部長），對法院長官「充耳高聳」表示憤慨，並表明決心：「慶齡等及全國救亡運動中人，斷不敢坐視沈等瘦困而可以獨享自由。」要求他們「迅予主張公道，勿失全國志士之心」。<sup>354</sup>

宋慶齡此行正氣磅礴、大義凜然，使同行者極為感動。胡子嬰回憶：「我們去蘇州時，酷日當空，悶熱難受，而回上海時又大雨傾盆，令人窒息。在這樣多變的惡劣天氣，又經旅途折騰，正在患病的孫夫人還是鎮定自若，巍然不動。」<sup>355</sup>

宋慶齡等人到蘇州親自要求入獄，更使「七君子」及律師們深受教育和感動。沙千里回憶：「我們七人在獄中雖被隔絕起來，但不僅沒有感到孤寂，而仍像站在浩浩蕩蕩的革命行

353 《宋慶齡等赴蘇請求羈押經過》，載《救國無罪》，時代文獻社一九三七年版。

354 《雙清文集》下卷，第二百二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355 胡子嬰：《光耀日月，氣貫長虹——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列，和全國人民心連心地結合在一起。我們從不曾考慮已經掌握在殺人魔王手中的自己的命運，而是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怒潮一浪高過一浪地奔騰前進，感到無比興奮。我們在獄中讀書寫作，鍛煉身體，充滿革命樂觀精神。特別是聽到以孫夫人為首的蜚聲中外的『入獄運動』時，我們的情緒更為高漲，感到同全國人民結合得更緊密了。我們深信，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英明主張一定能夠實現……我們身在獄中，心在戰場。孫夫人奮不顧身、英勇戰鬥的精神，是我們的



被救出獄的「七君子」與救國會領導人馬相伯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時、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遠。

榜樣，給予了我們莫大的安慰和力量。」<sup>356</sup>

當晚，他們七人聯名寫信給宋慶齡表示感謝。信中說：「聞昨日扶病率同諸友蒞蘇投案，正義熱情，使鈞儒等衷心感動，無可言狀。」信中更對宋慶齡的行動表示無限的欽佩：「鈞儒等深信先生之號召，必能使全國人心，為之振奮，司法積弊，逐漸澄清，民主權利奠定基礎，其在歷史上意義之重大，實不可思議也。」<sup>357</sup>

就這樣，在宋慶齡等人堅決鬥爭和國內外進步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對「七君子」強行判罪的陰謀，始終未能得逞。

馮玉祥不負眾望，在事件剛發生就積極營救「七君子」，特別在關鍵時刻拯救「七君子」的生命。那是在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中的CC派頭子陳果夫、陳立夫因手中無軍權，沒有辦法救「老頭子」蔣介石，就遷怒於「七君子」，藉口救國會曾鼓動張學良、楊虎城抗日救國及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時要求釋放救國會領袖為由，提出要槍斃「七君子」，以警告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立即加以阻止，指出千萬不可輕率從事，因為即使殺了沈鈞儒等人，也救不了蔣介石，卻堵死了與張學良、楊虎城通氣的餘地，對解決西安事變反而不利。同時，馮玉祥還囑咐胡子嬰等，速去蘇州看守所與「七君子」聯繫，採取措施加以防範，二陳的陰謀終未得逞。

356 沙千里：《高山仰止，永垂青史》，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357 沙千里：《漫話救國會》第七十六、七十七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七七」抗戰爆發後，國民黨當局對「七君子」案件已難以繼續審理，七月三十一日終於無條件釋放。營救「七君子」的運動取得了完全勝利。

宋慶齡領導的「救國入獄運動」，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威風，同時把「七君子」被捕後在一部分群眾中的退縮情緒一掃而光，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更加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這是國民黨政府所沒有料到的。通過這個運動，救國會非但沒有垮掉，反而更加壯大地發展起來，威信也更高，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一個很有戰鬥力的左翼組織，在後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宋慶齡領導的「救國入獄運動」，是抗戰爆發前全國抗日救亡洪流中激起的一朵瑰麗的浪花，充分表現她高超的鬥爭藝術，成為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史上一段佳話，是宋慶齡傳奇中又一精彩的篇章，永遠為後人所傳頌。

## 五、委專人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會議

宋慶齡和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引起了世界和平和進步人士的關注。同時，宋慶齡領導救國會工作的過程中，也密切注視著國際上反法西斯鬥爭的進展，努力把二者結合起來，互相支援。

一九三六年七月，宋慶齡接到通知，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將於九月十日在巴黎舉行擴大

會議，討論援助西班牙和各國反法西斯鬥爭的群眾運動的問題。宋慶齡是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副主席，應該出席會議。但是考慮到國內鬥爭的需要以及她受反動當局的監視，不便出國。經與中共地下黨商量後，決定以宋慶齡的名義派中共地下黨員、當時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黨組書記錢俊瑞去參加。<sup>358</sup>

八月十五日，宋慶齡通過史沫特萊約錢俊瑞到寓所，告知他這一決定。宋慶齡與錢俊瑞談話兩次，第二次談話時，宋慶齡將專程來華請她去巴黎的美國反法西斯戰士達德教授介紹給錢俊瑞，並用精湛流利的英語說：「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的目標你是知道的，它反對德國納粹法西斯，反對義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反對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你說，這個法西斯我們不應該反對？」錢俊瑞與達德同聲回答：「當然要反對，而且要反對到底。」她笑著對錢俊瑞說：「對，你說得對！所以你這次去巴黎開會，就要代表我把這層意思講透：全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不但要反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還要反對日本軍閥財閥的法西斯主義，他們都是兇惡的侵略者、壓迫者。還有一個卑鄙殘暴的蔣介石法西斯主義，它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出賣領土和主權。對於東方這兩個法西斯主義，歐美各國人民還不很清楚。達德教授，你說是不是？」達德說：「是。這次錢同志出去，要把這點講得充分些。」宋慶齡又囑咐錢俊瑞說：「你應當好好準備一下，多搜集些材料，並且同德意法西斯作對比，指

明它們的性質和我們對它們作鬥爭的任務。要說明我們在這裡的鬥爭同歐洲各國人民的鬥爭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有共同的目標，我們休戚相關。全世界人民都應該起來反對法西斯，反對壓迫和剝削，掙脫自己的奴隸地位。」<sup>359</sup>

宋慶齡還積極向外國朋友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她對達德說：「中國共產黨最近發了一個宣言（指『八一宣言』），作了一個決議（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窯堡會議決議）。我看很對，我完全贊成。你看過嗎？」當達德說還沒有看到時，宋慶齡立即囑咐錢俊瑞想法找一份給他，翻譯給他聽。如果找不到，也可以先把大意給他說一說。接著她又十分嚴肅地說：「我這樣說，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要達德教授也懂得一點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達德教授比你年紀大些，錢同志，他鬥爭經驗豐富，他這次陪你去，可以幫你很多忙。他瞭解一點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就可以幫助你，告訴你，在大會上，在小組會上，在個別談話中，應該著重講些什麼，少講些什麼，哪些東西可以不講。因為他瞭解情況多，人頭熟，可以幫助你說話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效果好。」她又對達德說：「你這次來中國是初次。你一定會發現中國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勸你相信，中國的情形一定會好起來的。中國有個共產黨，我希望就在這裡。你們美國朋友中有不少相當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比如史沫特萊、斯諾、格蘭尼奇，他們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我看他們有眼光，有見識。他們

也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和你雖然初次見面，但我相信，我們會成為好朋友的。」

從上述宋慶齡向錢俊瑞布置赴歐任務中可以看出，宋慶齡從事革命鬥爭和國際鬥爭的經驗已經相當豐富，考慮問題十分仔細；而對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的宣傳，又是那樣的滿腔熱情。

錢俊瑞代表團在歐洲成功地參加了兩個大會，根據共產黨的指示和宋慶齡的教誨做了不少工作，也學習了不少東西。

那次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擴大會議，是由羅曼·羅蘭和著名科學家朗之萬主持進行的。他們在會上多次讚揚宋慶齡對國際反法西斯運動和保衛世界和平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羅曼·羅蘭熱情洋溢地說：「你們以為我們卓越的副主席宋慶齡僅僅是一朵香滿全球的鮮豔花朵嗎？不！不！她是一頭名副其實的力圖衝破一切羅網的雄獅。」

360

## 六、力促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

中國共產黨逼蔣抗日政策的實現，首當歸功於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本身是蔣介石自己逼出來的。他一面逮捕「七君子」，繼續鎮壓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面親自到西安，逼迫已與紅軍達成停戰協定的張學良、楊虎城重點「剿共」戰火，進行毫無希望取勝而又是民族自相殘殺、親痛仇快的內戰。實際上是蔣介石企圖借刀殺人，

置張學良、楊虎城於死地。張學良、楊虎城為了自救，被迫實行「兵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扣押蔣介石，並且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救國會領袖等。

宋慶齡對張學良、楊虎城的主張，極表贊同。當孔祥熙要求她發表聲明，譴責張學良、楊虎城並要求無條件釋放蔣介石時，她果斷地回答說：「張學良做得對。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甚至還會走得更遠！」<sup>361</sup>

但是，宋慶齡畢竟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她對這一事變的態度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鑒於蔣介石十年來的暴政及其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西安事變後，不少人都主張槍斃蔣介石，一般都認為蔣介石必死無疑。

蔣介石的嘍羅——藍衣社的特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給宋慶齡寄了一封恐嚇信，信中附了兩顆子彈，意思是，蔣介石已被扣留在西安，萬一他有生命危險，這些子彈是不認人的。宋慶齡把此信交給中共聯絡員李雲，要她報告組織，揭露特務的卑鄙伎倆，並輕蔑地說：「不怕他們。」她將生死置之度外，照常堅持工作。<sup>362</sup>

宋慶齡毫不畏懼特務的恫嚇，也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唯一要考慮的是國家民族的利益。無論從個人或革命的恩怨出發，她對蔣介石的鄙夷和仇恨，不在任何人之下。但是，她胸懷全域，深謀遠慮，而且獨具慧眼，再次表現出非凡的遠見卓識。宋慶齡在事變第二天（即十三日）

361 [美] 埃德加·斯诺：《復始之旅》第一百一十二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362 李雲：《三十年代在慶齡同志身邊兩年》，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得知消息後，就立即作出了要親赴西安勸說張學良、楊虎城釋放蔣介石的決定。

這天，她把胡子嬰約到家中。胡子嬰以為作惡萬端的獨夫民賊落入羅網，宋慶齡一定會很高興的。哪知她帶著焦急的樣子，問胡子嬰能否陪她到西安去？胡子嬰好奇地詢問去做什麼時，得到的出乎意料的回答是：要「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接著宋慶齡婉轉地解釋說，何應欽等親日派唯恐中國不亂，蔣介石如果被殺，內戰勢必全面爆發，日軍就可長驅直入，侵佔全中國。胡子嬰馬上明白了這個道理，決定隨她去西安。然後，她們兩人還步行到辣斐德路何香凝寓所，約香凝何同行。何香凝正患心臟病，常臥床不起，但聽了宋慶齡的意見後也同意一起去西安。宋慶齡約胡子嬰到晚上八時聽最後確定動身的時間。到時候胡子嬰接到宋慶齡的電話說「不去了」。原來，宋慶齡叫孫科為她準備去西安的飛機時，南京政府正在調兵遣將，準備轟炸西安，孫科對此無能為力，宋慶齡只好取消西安之行。從這天起她就閉門謝客，不見任何人，救國會只有胡子嬰一個人單獨同她聯繫。<sup>363</sup>

宋慶齡為民族大業操心，憂心忡忡，度日如年，唯恐內戰爆發。在這危急關頭，只有中國共產黨與她靈犀相通，再次顯示出英雄所見相同。中共中央經過鄭重考慮，作出了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決定，提議張學良、楊虎城釋放蔣介石，條件是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為首的英美派，也與何應欽等人企圖擴大事態

363 參見胡子嬰：《光耀日月，氣貫長虹——回憶宋慶齡名譽主席在救國會時期二三事》，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製造內戰的陰謀作了堅決的鬥爭。他倆先後到西安，調解事變，做蔣介石的工作，與張學良、楊虎城談判，與共產黨談判，終於使宋慶齡擔心的內戰沒有發生。因此，當胡蘭畦帶著李濟深致宋慶齡的信到宋家，建議宋慶齡去西安做張學良、楊虎城工作，聯蔣抗日，防止內戰時，宋慶齡回答：「從這幾天發展的情況看來，還不至於釀成內戰。這個信我直接回李先生。」<sup>364</sup>

由於多方面的努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各項談判達成了協議，蔣介石答應釋放一切政治犯。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時，二宋也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雙方注意到宋慶齡在保障民權、營救政治犯和救國會領袖方面長期不懈的努力，以及她的崇高威望，決定與她商量釋放政治犯的具體辦法。<sup>365</sup>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十年內戰最終結束。張學良、楊虎城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同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也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為促使國共合作儘快實現，致電國民黨中央，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召開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取消兩個政權敵對、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

364 《胡蘭畦回憶錄》第三百一十三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365 《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載《周恩來選集》上卷，第七十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宋慶齡為配合共產黨的積極的讓步政策，決定接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毛澤東來信的請求，一改大革命失敗以來對國民黨中央的抵制態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員資格，參加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不過，這也是她最後一次參加國民黨中央會議。因為她不久就發現，蔣介石不願意根本改變獨裁賣國的政策。）

宋慶齡這次參加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異乎尋常的行動。她總是把民族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住首位，把個人恩怨放在次要的服從的地位。

在二月十五日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宋慶齡領銜與何香凝、馮玉祥、孫科、李烈鈞、經亨頤等十三人聯名，向大會提出了《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

提案指出：「在過去六月中，我們得到中國共產黨幾封致本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和通電，請求國共再度合作，聯合抵抗日本。它證明團結反對侵略者的鬥爭就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此事更進一步地為西安事件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既然願意停止危害本黨政治權力的活功，並支持統一抗日，所以本黨更加便利來取得恢復先總理三大政策的機會，以挽救本黨和祖國免受奴役，並完成我們的革命工作。」<sup>366</sup>

宋慶齡還在全會上作了題為《實行孫中山的遺囑》的演說，對上述提案進行說明。她說：「每一個中國愛國志士現在都慶幸政府在這些痛苦經驗之後已開始瞭解，救國必須停止內爭，

而且必須運用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她強調：「一切內爭是可以、並且應當和平友好地解決。內戰必須不再發生，和平統一必須實現。我們必須趕快建立反抗外來侵略的中國國防。」<sup>367</sup>

在會上，宋慶齡與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汪精衛等提出堅持「剿共」的政治決議案，以與宋慶齡等的上述提案相對抗。針對汪精衛之流的反共叫囂，宋慶齡義正詞嚴地責斥道：「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個別人士不瞭解救國必先結束內戰的道理。在今天居然還可以聽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調，這是多麼荒謬！我們要先打斷一隻手臂之後再去抗日嗎？」

由於會上國民黨親日派和頑固分子的阻撓，宋慶齡等人的提案未被通過。然而，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歷史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國民黨內部發生很大變化，英美派逐漸占了優勢，所以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被大會原則上接受，正式通過了同共產黨關係的「四項原則」，決定在統一軍隊編制和政權形式等條件下，可以與共產黨合作。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門打開了。

會後，中國共產黨派出周恩來、葉劍英與國民黨蔣介石、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等地進行多次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並一步一步地取得了進展。「七七」抗戰爆發後，

367 宋慶齡：《實行孫中山的遺囑——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的演詞》（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〇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形勢對兩黨合作的要求更為迫切，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交給國民黨一個《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並經雙方約定隨之發表蔣介石承認中共合法地位的談話。

但是，蔣介石又故意拖延這個宣言和談話的發表。宋慶齡為此接連發表文章，推動國民黨加快前進的步伐，力促正式建立國共再次合作。她指出，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迅速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合作，以團結禦侮，共赴國難，並批評國民黨三中全會對國共和解提出了「無理要求」，「雖然內戰已經停止，但是關於與共產黨和解的事卻尚未得到任何官方消息」。她重申孫中山關於「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的思想，強調國共合作對挽救國民黨「墮落」的意義，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她敦促國民黨領導人切實改正「十年反共戰爭」的錯誤，指出：「現在雖然晚了，但改正這個大錯誤，晚一些總比永遠不改更好。」她讚揚「共產黨與政府合作抗日的誠意，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證明……他們已盡了最大力量來保持中國的團結。所以國民黨如果願意遵循孫中山聯合工農的政策，它決不應拒絕共產黨在救國工作中所給予的幫助。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須團結在一起」。<sup>368</sup>

經過宋慶齡和各方面愛國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動和督促，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蔣介石的談話，終於在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當抗戰前線緊張之際，經過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先後發

表。這就正式宣告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而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共產黨極其尊重宋慶齡，八月初，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與蔣介石談判後，經過上海時，特地向宋慶齡通報了談判的情況，使她及時瞭解國共談判的進展。宋慶齡非常興奮，在家中熱情接待了他們，並表示堅決擁護共產黨關於建立國共合作的宣言。

九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後，宋慶齡歡欣鼓舞，內心無比激動，立即連續寫出了《國共統一運動感言》《兩個「十月」》等文章，表達自己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由衷的高興和願望。她說，「這幾天讀了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蔣委員長團結禦侮的談話，使我異常地興奮，異常地感動」，「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回想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兄弟黨，在最近十年以來，互相對立互相殺戮，這是首創國共合作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到的。到最後，這兩個兄弟黨居然言歸於好，重新攜著手，為中國民族獨立解放而鬥爭」。<sup>369</sup>她用詩一般的語言歡呼：「充滿了希望的白晝正在代替令人失望的漫長黑夜……我們重新高舉孫中山的理想。我們眺望自由，我們的心隨著鼓舞起來。今天在我們領土上的每個角落裡我們聽到了炮火的怒吼，這是慶祝我們全國統一的禮炮。」<sup>370</sup>

然後，她誠摯地向國共兩黨進一步呼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這民族危機千鈞一

369 宋慶齡：《國共統一運動感言》，載《宋慶齡自傳》第二十九、三十一頁，華光出版社一九三八年版。

370 宋慶齡：《兩個「十月」》，載《抗戰》雜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髮的今日，一切過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應該一筆勾銷，大家都一心一意，為爭取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共同努力。」<sup>371</sup>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語，突出地表現了宋慶齡作為一個偉大的女政治家的獨特的風格。當壓迫到來時，她會像雄獅一樣，怒吼著撲向敵人，保護人民；而當那些幹了許多壞事的人，有所轉變，哪怕是很小很勉強的轉變，她為了民族利益，會立即捐棄前嫌，笑泯恩怨，給予熱情的歡迎，表現出慈母一樣的善良和大海一般的胸懷。

但是，她並不盲目主張忘記過去。她說：「過去國共分裂這一段悲慘歷史，卻仍然值得我們的記取。國民黨同志應該謹記著：要是不顧先總理遺教，拋棄了工農大眾利益，將成為民族罪人，等於國民黨的自殺。共產黨同志也應該記住：只有在孫總理遺教領導之下，和中國國民黨真誠坦白合作，把全民打成一片，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我相信兩黨同志，經過十年以來長期的慘痛教訓，再加上日寇無情的殘酷的進攻，一定能夠本『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古訓，誠信地友愛地團結成一體。」

這表明，宋慶齡當時對國民黨是寄於滿腔熱情和希望的。但是，當她稍後發現蔣介石在被迫抗戰同時，仍然堅持壓迫民眾運動，堅持獨裁政策；與共產黨的合作也並非真誠，而是妄圖「溶共」、「滅共」時，她對國民黨就徹底失望了。

與此同時，她感到欣慰的是共產黨經過十年鍛煉，終於克服「左」的干擾，短短兩年，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取得驚人的進步，完全成熟成為中國革命堅強的領導者。孫中山的遺教，她在孫中山逝世後堅持的革命理想，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於是她對共產黨更加敬仰和熱愛，欽羨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光榮。李雲回憶說：「記得一九三七年的一天，我們在談工作，慶齡同志突然把聲音放低了，輕輕地對我說『我算不算黨員？』」黨組織研究後，讓李雲回答她：「你同共產黨員一樣。」宋慶齡微笑地點點頭。<sup>372</sup>

從此，她就更加自覺地做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為黨的目際，為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盡心盡力地去工作，再接再厲，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共產黨交給她的許多特殊任務。

在翻開宋慶齡史冊新的一頁的時候，回顧她大革命失敗後十年來艱苦跋涉、奮勇拼搏的足跡，不禁使人無限欽佩與敬仰，正如廖承志所述：「……風雨飄搖的三十年代，她艱苦奮鬥，如千丈巨岩，頂著一浪高似一浪的衝擊，在狂風暴雨中巍然屹立，是她一生中最突出的一段。」<sup>373</sup>

每個偉人都有一生中最輝煌的年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則是宋慶齡最輝煌的年代。

372 李雲：《三十年代在慶齡同志身邊兩年》，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373 廖承志：《我的回憶之二》，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